对一个特殊人物的开创性研究

——读《文化怪杰辜鸿铭》

郭双林

一气读完黄兴涛的《文化怪杰辜鸿铭》一书，掩卷长思，不禁有一种茫茫然的苍凉感、沉重感。我不止一次地为辜鸿铭具有如此超人的天赋、敏锐的洞察力、卓尔不群的人格，但却走了一条漫长的、孤声呐喊、苦苦愤争、而又不被人理解的人生之路而扼腕，用黄兴涛的话说："他以一个喜剧形象，表演了一出他个人的历史悲剧。"（第 323 页）这是辜鸿铭个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同时，我也不止一次地为作者在本书中深刻的剖析、精彩的论述而击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辜鸿铭文化活动及其思想的学术专著，《文化怪杰辜鸿铭》一书的成就是非常显著的。作者首次全面搜集、翻译、整理了辜氏的中外文著述，特别是英、德、日、法等多种外文著述，在此基础上，系统论述了辜氏一生的文化活动和思想，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对辜氏何以为"怪"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从而开创了辜氏研究的崭新局面，不仅向一般读者展现了辜鸿铭的真实面貌，为后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并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中西文化关系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辟了新的思路。

就辜鸿铭个人的性格而言，他既不适合作名儒，更不适合作名臣，做一介名士倒还符合他的真性情。在中国，大凡名士，都无可避免地要被人目为"狂狷"、"怪异"。的确，凡是称得上名士的人，一般都天分极高，秉性狷介，恃才傲物，动辄盛气凌人、使气骂座、辱下忤上，在崇尚温良恭俭让，标榜谦谦君子的国度里，他们的言行显得那么不合时宜。辜鸿铭虽然也堪称一介名士，但他与以往的所谓名士颇不相同，以往的名士，无论是阮籍、嵇康，还是徐渭、李贽，乃至近代的龚自珍，他们大都在不同程度上背离儒家的礼教，我行我素。辜鸿铭却是因为在传统儒学已经式微，西学已然勃兴的情况下，以一个精通西学之人，而服膺儒学，并身体力行。他甚至爱屋及乌，在清朝灭亡后仍拖着一条干瘪的辫子，并对人们公认的"国渣"小脚、纳妾、辫子、八股文、廷杖、随地吐痰等进行不同程度的辩护，因而被人们视为"怪诞"。怪者何？异也。异者何？分也，与众不同者也。所以"怪"与"怪诞"并不完全相同。黄兴涛在《文化怪杰辜鸿铭》一书，紧紧抓住辜氏的"怪"这一点，从此切入，对其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的文化活动和思想展开了论述。但作者并不是一味在"怪诞"上做文章，去钩奇稽异，探隐索幽，以迎合某些读者。作者甚至连"怪异"一词也未使用，而采用了"奇特"一词，认为辜氏的"奇特"之处，主要表现为精通西学，却极端保守；在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文化思想界发生过相当影响；是五四以前唯一有份量的向西方弘扬中国文化的中国学者；独特的文化保守思想。此外，他我行我素，睥睨一切，善辩骂人，诙谐不羁等等，处处给人以离奇放诞的印象。对学术界一些人围绕辜氏研究的不良现象，作者指出："长期以来，人们更多的只是关注他顽固的表面；满足于叙述他的逸闻趣事，流于诟病和嘲弄，不曾对他的文化活动和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以致留给人们一个纯粹概念化、表

面化而缺乏思想内容的顽固小丑形象。这是有欠客观和公平的。"(第12页)因此,作者对辜鸿铭"奇特"的原因,或者说辜鸿铭是如何走向保守之途,作了进一步深入的探讨,认为辜鸿铭之所以回归祖国和折向传统,首先是受西方浪漫主义,特别是卡莱尔思想的影响;同时,莎士比亚、歌德、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对辜氏也发生了相当的影响。此外,义父布朗等人的影响、华侨的爱国情结、个人偏激的性格等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当然,所有这一切,只是确立了辜氏日后思想和文化活动的基本导向,归国后因受张之洞及其幕僚的影响,其文化保守思想才最终定型。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均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尽管这些因素有主次之分。作者在这里充分考察了影响辜氏走向保守的多种因素,分析是比较深刻的,避免了前人只见一斑不及其余的简单化现象。

辜鸿铭的某些思想行为看起来的确怪诞,但更多的仅是奇特而已。这里所说的"奇特"并非贬义,而仅仅是指与众不同,或者说他干了前人和他同时代人所没有干的事。辜氏早年对西方中国学和中国学家的批评、对西方在华传教和传教士的抨击就是如此。对此,作者在书中列专章进行了讨论。辜鸿铭曾经指出:"的确,对于任何一个完全了解欧洲这种为了智识启蒙而斗争历史的人来说,这些在欧洲焚烧和残害科学家的教中人,却在中国把自己装扮成为科学和智识事业的斗士,这看起来该是多么奇怪和荒唐可笑。"(第66页)"我认为,……在中国的整个传教事业,只不过是一个为了那些从欧美来的失业的专职人员利益的一种巨大的慈善计划罢了。"(第67页)这是辜氏对西方传教士的无情揭露和鞭挞。辜氏又指出:"一切愚蠢和感情用事的憎恨当然应该制止,但那种归根结底是正义的憎恨,我相信再多的炸弹和葡萄弹也摧毁不了它。……那些了解人民脾气的人,我想应当告诉外国公众,从外国炮舰上开火的第一炮,就将成为一场战争的标志,不是与政府的对抗——正如我们迄今对外战争那样——而是一场反对人民的战争。"(第69页)这是代表民众利益的正义之声。当然,辜鸿铭不仅有着满腔的爱国激情,也不乏理智的辩论。正因此,他的文章一发表,便引起西方舆论界的惊异和一定程度的同情。作者在本章中对辜鸿铭的这一系列活动及思想主张进行了详细论述,在指出其不足的同时,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辜鸿铭一生对西方汉学的不懈的、尖锐的批评,大多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尤其是对其文化优越感和偏见的批评充满了弱小民族反抗文化歧视的民族正气。对于纠正传教士、汉学家以及一般西方人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误解,促进西方汉学健康地发展,增进西方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为其它途径所难以替代的作用。"(第60—61页)"毫无疑问,辜氏是战斗在反洋教斗争的另一战场,这一战场几乎是他一人独自开辟的,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也是最为主要的战士。……他的抨击不仅有力地配合了国内民众朴素的反洋教斗争,而且由于在思想层次上高出当时领导民众、制造舆论的一般士大夫一筹,还能起到前者所难以起到的特殊作用。"(第70页)这样的评价丝毫也不过分。

辜鸿铭还有更辉煌的成就,即英译儒经,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对于这项不朽的事业,作者在书中列专章进行了探讨。本章也是本书中最见作者学术功底的一章。作者首先分析了辜鸿铭英译儒经的源起和动机,指出:对西方汉学、尤其是对理雅各儒经翻译的不满,是其直接动因;向西方人传播儒家文化,纠正理雅各等人造成的误解以消除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是其深沉的内在动机。至于辜氏究竟翻译了哪些儒经,作者经过仔细考证,认为辜氏仅翻译了《论语》、《中庸》、《大学》,正式出版、发行的只有前两部,其它各种说法均为误传。作者进而将辜氏英译儒经和理雅各所译儒经进行对勘,通过比较来分析评判辜氏英译儒经的特点与得失。这

是一项难能可贵的工作。我们知道,要进行这项研究,除了必须具备较高的外语、古汉语水平和传统文化素养外,还必须有严谨的态度和科学方法,这些条件,特别是后者,在往常看来或许没什么,但在崇尚"短平快"的今天却显得尤为可贵。正是作者具备了上述条件,再加之以扎扎实实的"冷板凳"工夫,才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作者认为,辜氏英译儒经,"其长处主要在于对儒家经义、经文辞气在总体上比此前的一般传教士和汉学家的译文有更好的传达,其短处则主要在于过于追求经义的传达(包括'求统一'),而造成释义化等毛病。"弄清其译经的源起和动机外,还将其译经活动放在儒经西译史的总体过程中去考察,经过多方对比、分析,最后指出:"辜鸿铭英译儒经一方面固然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和不足,但另一方面也有着显著的优点和长处;他企图通过这一活动实现其文化保守主义的目标,虽不免天真,但他主动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典籍,希望由此增进西方人对中国人及其文明的认识与了解、并赢得他们的尊重,却很有远见。在这方面,他确实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看","他所取得的成绩无疑是主要的,必须予以充分的肯定。"(106—107 页)这样的评价是非常客观的。

作为研究辜氏文化活动和思想的学术专著,《文化怪杰辜鸿铭》一书必须对辜氏的文明观做出解释。作者认为,辜氏的中西文明观是其一切思想的内在基础和逻辑核心,因而不仅在书中的许多地方涉及到这一问题,还分列两章专门进行讨论。对此,作者首先论述了辜氏中西文明观形成发展的线索及逻辑核心,认为辜氏的中西文明观经历了一次世界大战前、战后至五四时期、晚年讲学日本时期三个阶段,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而其对文明内涵的理解及其评判方法又构成其中西文明观的思想基点和逻辑核心。作者对辜氏运用其在西方所学的近代生物学知识和有关西方经济发展的最新信息驳斥欧美人单纯以物质生活水平来衡量一个民族观点予以充分的肯定,但对辜氏关于文明的阐述,即文明是真正的教养,亦即正确的人生之道和生活态度,以及辜氏单纯以道德教养作为评判文明的准绳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辜氏的文明观,是从批评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以一种偏颇代替另一种偏颇,在根本上是完全立不住的。"(第 157 页)在作者看来,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包括物质经济方面的进步,也蕴含着道德等精神境界的升华,内涵丰富多彩。与此相一致,评判文明的标准也绝非仅以某一方面的单一尺度所能为功。"事实上,看一个民族文明与否,文明的程度如何,这绝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评判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物质进步和精神境界的全面衡量"问题。那么在评判文明时,究竟如何来看待经济发展物质进步、道德修养的提高及其相互关系的呢?作者认为,"经济的发展、物质的进步不仅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文明的基础,它在根本上制约着道德等精神文明的水平。这种制约,并非象辜氏所说的那样只是文明存在的条件而已,无关大旨,而是直接地影响着精神文明的升华。"(第 136 页)作者的这些论述无疑是客观的,但似乎有点"经典"化。就笔者看来,文明是相对于野蛮而言的,它除了应该包括经济的发展、物质的进步、道德教养的提高、文化生活的丰富外,还应包括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同类相恤的本性,或者叫做人性。人性的发展本来应该与道德教养的提高同步,但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并非如此,直至今日,人类在自相残杀时所表现出来的凶残和野蛮,要远远超过许多同类相恤的野兽,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返祖现象,而是人类进化尚不完善的结果。更何况道德教养,亦即辜氏所说的"接物待人的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有时是虚假的,故意做作的。换句话说,有些人的所谓文明仅仅是一张"假画皮",而"筋骨"里仍然带有野蛮的兽性。20 世纪前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从原则上、理论上讲,经济的发展、物质的

进步不仅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根本上制约着道德等精神文明的水平，直接影响着精神文明的升华。但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情况却异常复杂，无论哪一个国家、民族或其中的哪一部分人，即使具有发达的物质文明，甚至具有了那种"接物待人的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所谓道德教养，只要"筋骨"里仍然带有野蛮的兽性，便难以担当起文明的称号。

此外，作者还对辜氏关于中西文明的异同、优劣，西方文明的困境及出路等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论述。如果就辜氏关于东方文明优于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的出路在于从东方中国来寻求拯救的法宝来看，特别是就其对缠足、纳妾、廷杖、八股文、辫子、太监、随地吐痰等的辩护来看，似乎可以说他是一个腐儒。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又绝非那种不谙世事的腐儒，在论世知人方面，他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且不说他对中西政治、语言、宗教的比较有高人一筹之处，单就他对晚清以来的改革运动的预言，就足以使人瞠目，他说："就我所见，目前中国的狂热的改革运动将注定导致一场灾难。"（第200页）在事后的今天，运用唯物史观，我们完全可以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但在当时那些实行自救的"改革者"看来，辜氏此言不啻梦呓。难怪张之洞要说他"知经而不知权"了。在知人方面，我们不能不提到辜氏对袁世凯的看法与态度。据本书介绍，自庚子以后，辜氏便不断与袁世凯为难，他不仅公开对袁氏的不学无术表示极端的厌恶，而且直斥其为"小人"、"中国的张伯伦"，"他甚至连一般的道德品质、一般的廉耻和责任感也不具备，连小偷和赌徒都不如"。他甚至认识到，袁氏"尽管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却不是一个没有能量的人"，预言当时的革命将以"袁世凯成为共和中国的总统而告终"，并断言袁世凯的统治不会长久，批评那些赞赏和支持袁世凯的外国人的昏愦和缺乏远见。（第293—298页）如果联系清末民初那些社会名流如康、梁、严、谭、孙、黄以及张謇、唐绍仪等人对袁世凯认识的前后变化与幻想，我们不禁为辜鸿铭的知人之明而深深折服，不论这种认识是通过理性还是直觉获得的。

更为可贵的还是辜氏那一身特立独行、不阿权贵的人格，他不仅在袁氏炙手可热的时候予以猛烈抨击，而且当身为民国总统的袁世凯托人以高薪聘其担任家庭教师，条件是"要求他缓和一下言辞"，其它既往不咎时，穷困潦倒的他却严词拒绝。他甚至在袁死后无视北洋政府全国停止一切娱乐，举哀三天的通令，公然在府上大宴宾客，表示庆贺。名士自风流，辜鸿铭的确不愧为一个风流名士，一个骨鲠之士。事实上，直到晚年，在"保守"、"怪诞"的背后，辜氏仍有着一付不曲学阿世的铮铮傲骨。

《文化怪杰辜鸿铭》一书所论，当然不止这些，作者在书中还对辜氏在庚子前后的活动、在国外的影响以及晚年赴日本讲学等作了详尽的讨论。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评述。在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作为一部系统论述辜鸿铭文化活动和思想的学术专著，《文化怪杰辜鸿铭》一书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除了作者坚实的学术功底、细腻的笔法和辛勤的劳作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掌握了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即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用作者的话说："在研究历史人物的时候，既要入乎其内，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了解人物自身思想与行为的内在逻辑；又要出乎其外，考察其与宏阔的时代背景相联系的特定的历史品格。这样，才能透过偶然性与必然性、个性与共性的层层迷雾，把握住人物的真实面目和历史价值。"（第354页）辜鸿铭这个人物的特殊性，也为作者提供了思想纵横驰骋的可能性。我们知道，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人物，辜鸿铭实在不算大，要研究他，必须仔细认真地对其扑朔迷离的一生作详尽的考察，从材料的搜集、整理到生平的考证，必须采用微观的研究方法；但辜鸿铭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人

（下转第128页）

纳兰性德亲属考辨(下)　刘德鸿　北方民族　1995:2
郑燮与满族人士的翰墨缘　张菊玲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1995:1
衰朽只悲同调尽——赵翼《随园吊袁子才》浅解　杨树彬　蔡国平　文史知识　1995:5
发展民族经济　开发建设边疆——松筠的改革思想及其在新疆的实践　贾允河　西北师大学报　1995:2
祖大寿家族中的一起袭职之争　安双成编选　历史档案　1995:2
北方诗人恒月山　高兴璠　满族研究　1995:1
顾苓生年确证　冯保善　文献　1995:2
论陶澍的历史地位　易舒生　益阳师专学报　1995:2
曹颜不可能即曹渊:与王家惠同志兼及周汝昌先生商榷　贾穗　红楼梦学刊　1995:1
黑龙江将军萨布素赏识的窦尔敦　兰殿君　团结报　1995.2.25
满族民族英雄——猛哥帖木儿　何溥莹　△满族文化　21　1995.5.25
满族诗人舒瞻　梦若　满族研究　1995:1
傅山的友人韩霖事迹补遗　白谦慎　山西大学学报　1995:2
乾隆朝满族新贵傅恒升迁原因探析　赵秉忠　北方论丛　1995:3
清代戏曲作家程镳事迹考订　刘汉忠　文献　1995:1
蓝鼎元及其著作考　李秉乾　福建图书馆学刊　1995:1

注:文中有△者为台湾出版物,有※者为香港出版物。

吴玉清　吴永兴　臧宇峰

(上接第 108 页)

物,他不仅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独特的保守主义者,而且作为西方近代浪漫主义大师卡莱尔的入室弟子,他与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泰戈尔等东西方大师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在西学东渐为主流的近代,匠心独运,努力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是近代中学西传的一个著名代表,在德国以及日本有着广泛的影响。因此,要研究辜鸿铭,就必须对当时的世界形势,特别是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有相当的了解。作者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在论述辜鸿铭的文化活动和思想时,对其每一次活动、每一观点、乃至儒经中每一个字的译法及性格、心态、思维逻辑等都作了详尽的考察,并始终将其活动和思想放在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历史过程中,放在西学东渐、中学西传的历史长河中,放在 19 世纪后半期和 20 世纪前半期世界历史的动荡变化中予以考察,因而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客观的,公允的,避免了现在人们因长期研究某一个历史人物而在评价该人物时经常感情用事的倾向。

当然,作为一部开创性的学术专著,《文化怪杰辜鸿铭》一书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之处,例如关于辜氏在庚子年间究竟是否进京襄助议和一事,学术界的看法颇不一致,作者对此采取了存疑的做法,这种态度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毕竟未能弄清,尚待进一步研究。再如,辜氏督办长江浚治局期间,曾力争惩罚贪污中国巨款的洋人,这颇能反映辜氏的性格。可惜作者在书中仅是提及此事,而未作进一步的阐述。当然,这些仅是白璧之瑕,丝毫不足以影响该书的价值。